

華人陪讀媽媽剛來就崩潰：騙子太多還是華人

在加拿大,之所以會有“陪讀媽媽”這個身份,主要還是家長認為北美適合孩子成長,哪怕自己放棄工作奔赴萬里去陪讀,也是值得的。

但,陪讀媽媽們對溫哥華總是好評如潮嗎?有些媽媽當然很適應,有些媽媽則各種水土不服——不只是因為寂寞、因為缺少交際圈,如今又多了一個原因:無處不在的詐騙。

本地華人論壇上,有人轉發了一位陪讀媽媽的遭遇:

簡單概括就是:短短3個月時間,就遇到了太多缺德的人、太多的騙子,連房東、早教機構老闆都不可信;甚至是抖音里都一大堆騙子,在國內都沒遇到過……在其他方面,這位陪讀媽媽也對溫哥華很失望,比如基礎設施太差、法律不健全等等,但最讓她難受的還是“騙子太多,而且很多都是華人。”

她說的騙子不只是短信、郵件詐騙,還包括一些明明什么都不懂,卻把自己包裝成業界專業人士的“詐騙”。難道,事實真是如此嗎?溫哥華各類華人“騙子”,真的如此之多,還是這位媽媽只是在說氣話?老鄉見老鄉,背後開一槍讓人頗感意外的是,論壇網友們普遍認同這一觀點,表示這年頭老鄉見老鄉,不是兩眼淚汪汪,而是背後開一槍。

溫哥華的日子不好過,這里華人移民水平參差不齊,他們為了謀生當然要不擇手段。想騙本地人,騙不成功,只能騙初來乍到什么都不懂的華人。最下作的騙術,當然是直接以加拿大稅

務局名義去所謂的催款,或者假扮銀行員工要求付某些款項,而且這類騙子的大本營有時不在加拿大,而是在其他監管不嚴的小國。初來乍到的華人普遍英文不好,喜歡“花錢消災”。

另外一種“騙術”,就是這位陪讀媽媽所說的:明明自己只是半瓶子水或者只是對某行業略知一二,謊稱自己是行業精英,給出一些不負



責的投資置業計劃或者申請計劃,讓華人家長蒙在鼓里。如果想安寧,請去小城鎮有網友在肯定了溫哥華華人愛騙華人這一事實後,不忘提醒陪讀媽媽們:你們來到溫哥華,必然會經歷各式各樣、花樣百出的詐騙,抱怨也沒用,要么自己有火眼金睛去識別,要么別來、要么去小城鎮。

相比于溫哥華,多倫多,包括蒙特利爾這樣

的大城市,加拿大的中小城鎮相對來說還比較安寧,騙子數量屈指可數,華人移民也很少會被針對。生活寂寞?如果跟國內大城市比,連多倫多、溫哥華都算的上寂寞,既然如此,乾脆去小城鎮享受安寧的寂寞,反正都是寂寞……信息主要來源,最好親自查網站一定要去大城市,如何儘可能防止被騙?有網友支招:一切信息的主要來源,不要只聽某個“專家”說,或者只看社交平台,而是要親自查閱正規網站,比如溫哥華私校的官網、加拿大政府網站、移民局網站。

看不懂?可以用自動翻譯或者請人翻譯,通過官方渠道獲取的信息最可信,當你帶著這些信息有備而來加拿大的時候,自然就不容易受騙。很簡單的例子:加拿大稅務局,加拿大銀行賬單絕不會直接通過電話形式問你要信用卡號;另外,無論是申請加拿大護照、申請楓葉卡還是申請孩子的私校,網站上都有明碼標價,如果中介獅子大開口,也好識別。其實英文詐騙,比中文詐騙還要多其實騙子在哪里都有,不論種族。之所以華人經常遇到華人騙子,主要是因為語言交流無障礙,造成“在加拿大遇到的騙子都是華人”的錯誤認知。來溫哥華待久了,你幾乎天天能收到各類英文詐騙短信,要么是“中獎了”、要么是“欠錢了”。

某種程度上說,英文詐騙比中文詐騙還容易得手,因為剛來溫哥華、不明真相的華人潛意識里認為“本地人應該更老實,不太會騙人”,結

果正是這種心態被利用。一向對印度裔不太待見的華人經常表示:“印度騙子和同胞騙子,最防不勝防。”首先,如今各級政府、部門的接線員大部分是印度裔,這就讓人們在接到詐騙電話時容易信以為真。其次,印度裔的英語語速很快,說話含糊不清,有的時候表達的內容讓你似懂非懂,最後乾脆就相信了。還有,最能想出“花式詐騙方法”的族裔,非印度裔莫屬。

在此前的文章中我們報道過:總部西雅圖的Hiya公司報告顯示,加拿大人接到的電話里有高達6.3%是詐騙電話,詐騙短信佔總短信的比例更高。各大領事館也是操碎了心,比如中國駐溫哥華、駐多倫多總領館,每隔一段時間都要提醒在加拿大的華人防範詐騙,但總是有人中招。頻繁的詐騙,會讓第一印象大打折扣說回開篇的陪讀媽媽,其實本地人經歷詐騙已經習以為常,因為本地人明白加拿大如今的詐騙有多猖獗,早已不會把加拿大當成一個天下無賊的地方,早已做到既來之則安之。之所以陪讀媽媽們會有如此大的反應,其實也能理解:她們捨棄了一切來陪孩子讀書,來承受這里的寂寞生活,本就希望這里能一切順心,沒想到對溫哥華的第一印象就是“處處是騙子”。

那么,就算溫哥華有再多的優點,在陪讀媽媽看來也起不到加分作用,對溫哥華會越來越失望,最終考慮離開。畢竟溫哥華是每年都能排進全球前5的“世界最宜居城市之一”,陪讀媽媽們會思考:這樣的生活狀態,能配得上這麼高的名次嗎?

留美華裔科學家生存調查:7成感到不安全加速回流

“我從未想過這個國家的某個地方會如此黑暗……我的經歷不僅毀了我的學術生涯,也毀了我的美國夢。”

這是一位華裔科學家的心聲,他曾經獲得過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教師早期職業發展(CAREER)獎,入籍美國,希望在這個國家發展他的事業。但他現在決定辭去美國的教職,甚至考慮全家搬離美國。

他的轉變和“中國行動計劃”有關。2018年,美國司法部啓動了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到現在為止已公開調查了約150名科學家,並對其中的20名科學家提出刑事指控,還有更多的未公開的調查。大部分被針對的科學家,都是中國或者華裔科學家。

2022年,美國司法部正式終結了中國行動計劃。但在美國的華裔或者亞裔科學家中,中國行動計劃已經留下長期的陰影。

中美科學家流動,從相向到相背而行

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謝宇及其合作者今年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發表的一項研究發現,美國政府於2018年發起的“中國行動計劃”,動搖了華裔學者的信心。2018年後,從美國返回中國的科學家穩步增加[1]。

通過篩選大型學術文獻計量數據庫中常見中國姓氏,研究團隊確定了一批華裔科學家。通過論文發表隸屬機構的變化,追蹤這些科學家是否離開美國去往其他國家工作。在2010-2021年間,共有接近兩萬名華裔科學家在美國開始了自己的職業生涯,而後離開美國,前往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繼續研究工作。

2018年前,生命科學、數學與物理科學、工程與計算機科學這幾個領域的華裔科學家,回國比例已呈穩步增長趨勢。但從2018年,也就是中國行動計劃啓動那一年之後,離美的華裔科學家比例增長明顯加速,三年間離開的速率比過去高了75%。

這個數據也符合謝宇在美國的觀察和感受。在他看來,過去中國科學家出國,主要是為了學術的發展,回國則往往是在美國找工作有困難,或者有所成就後回國為中國科學做貢獻。2018年之後,因為政治或者和中國合作等原因,被政府起訴、調查後離開美國的華裔科學家越來越多了。

謝宇把改革開放以來中美科技人才流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外流,從80年代初到2000年左右,大量學生去美國留學,有條件都會儘量選擇在美國工作。第二階段是精英回流,2000年以後,有成就的資深華裔科學家開始回國,代表性的人物是施一公和饒毅。這一階段保證了回國科技人才的生活和工作條件,吸引了資深科學家回國工作。第三階段是2018年後,中國行動計劃的啓動推動了華裔科學家的加速回流。

2010年離開美國的華裔科學家中,只有不到一半(48%)移居中國大陸和香港,52%選擇移居其他國家。到2021年,移居中國的華裔科學家的比例增加到了67%。

從互相成就到猜疑

中美在科學上本來是互相成就的關係,甚至已成爲彼此的最大的合作者。

2000年代開始,從合著論文的數量上看,中國和美國之間的科學合作迅速增長。到2011年,中國已超越英國、日本和德國等美國長期科學合作夥伴,成爲美國最大的合作夥伴。從增長速度和幅度上看,也遠超開放後和美國進行科學合作的俄羅斯以及一衆東歐國家。

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的數據顯示,美國與許多其他國家的合著關係多年來增幅一般在

1%-2%之間,而與中國的合著關係從2002年的5%,迅速增至2012年的16.2%[2]。

中美雙方都是合作的受益者。對美國來說,華裔科學家帶來了可觀的生產力提煉,一項研究發現,有華裔科學家參與的論文,在發表三年後的平均引用數可以達到22.3,沒有華裔科學家參與的論文平均引用數不到15。比起單純出自美國或中國本土的論文,有華裔或者海歸學者參與的論文平均被引次數更多,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的比例也更高[3]。

中國也從合作中受益。發揮關鍵作用的,恰恰是經常被批評沒有爲國效力的華裔科學家群體,他們是連接中國科學界和世界科學界的橋樑。

一項研究表明,華裔科學家和中國科學家合作的幾率,是其他海外科學家的5.6倍。同時,華裔科學家引用中國科學家論文的次數也更多,反過來,這些華裔科學家的論文也得到了中國科學家的更多引用。通過這個渠道,中國科學界和世界科學界得以聯繫起來,始終能瞭解到國際學術界的前沿知識[4]。

對此,謝宇表示,中國的科學發展離不開世界。沒有中美之間長期良好的合作和交流,中國科學也不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達到今天的領先地位。

中美在科學上的合作,帶動了世界科學合作的潮流。從1991年到2011年這段時間,堪稱國際科學合作的黃金年代,國際合著的論文在所有科學論文中所佔的比例增加了一倍多。其中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中國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國際科學合作之中。

而美國和中國是最大的合作夥伴,都是全球科技合作的受益者,也是最大的貢獻者。數據分析顯示,自1980年以來的40年間,中美合作科研發表的成果以20%的年增長率突飛猛進。在《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收錄的全球知識產出中,有中國或美國學者參與貢獻的學術成果佔全球科技論文產出總量的五分之一以上[5]。

然而隨着中美關係的緊張,兩國科學合作的緊密程度也有所下降。中美合作論文的上升趨勢在2010年代末放緩,然後從2020年到2022年下降了10.5%。從合作研究的佔比上看,兩國相比過去出現了脫鉤的跡象。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全球政策與戰略學院副教授賈瑞雪與合作者的研究顯示,2013年以來,中國一直是美國學者在生命科學領域合作最頻繁的國際合作夥伴。然而,自2019年之後,在美國合作的各個國家之中,只有中美合作論文的比例下降。甚至和中國科學家合作的美國PI,合作論文的引用率也出現了下降[6]。

現在中國仍然是中國合作者最大的合作夥伴,2022年中美合作的論文數量仍然比第二名高出74%。但過去坦誠合作的信心,已經逐漸被相互之間的懷疑侵蝕。

“在我與中國合作的鼎盛時期,我們得到了美國政府的支持,並通過與中國的合作,獲得了私營部門和中國資助機構的投資……當時建立這種合作非常容易……現在要建立這種合作真的很難。賈瑞雪研究團隊訪談的一位華裔科學家如此說。

華裔科學家的尷尬境遇

“中國行動計劃名亡實存。”這是謝宇研究團隊對中國行動計劃“遺產”的評價。

雖然制度上的中國行動計劃已經終結,但它已經在華裔和亞裔科學家心中種下不安的種子。

對1304名在美國大學擁有終身教職的華裔科學家的調查顯示,科學家們有着強烈的不安和恐懼感:35%的受訪者感覺在美國不受歡

迎,72%的人覺得作爲學術研究者不安全;42%的人害怕進行研究;65%擔心與中國的合作。

研究團隊成員、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的黃俊銘博士解釋了調查中這幾種心態的區別。“不安”源于感知到各種潛在威脅,這包括對美國政府針對中國學者進行的審查以及針對亞裔社群的歧視。“不受欢迎”指的是華裔科學家在美國學術界的大環境中感受到的接納程度不高,缺乏友好氛圍。“害怕進行研究”則是華裔科學家們擔憂正常的研究活動,尤其是與中國學術機構或學者的合作,會遭遇不公正的對待。

無論是作爲華裔人士還是華裔科學家,他們都感受到了不同來源的威脅。65%的被調查者表示因爲美國存在的反亞裔仇恨和暴力行爲而感到不安,同時66%的人對美國政府對華裔科學家的調查表示擔憂。

在調查問卷的結尾,被調查者可以附上自己的一段評論。對評論的用詞統計顯示,“中國行動計劃”出現了23次,“歧視”出現了19次。

這些擔心可能會轉化成行動。獲得聯邦撥款的受訪者中有45%表示,他們現在希望避免申請聯邦撥款,61%的人考慮過離開美國。

華裔科學家還要擔心實驗室的運營和存續問題。高達86%的受訪者認爲,與5年前相比,現在招收頂尖國際學生更加困難。這對計劃招收中國博士的華裔科學家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在當今的美國勞動力市場,對於中國國際學生的招聘歧視非常普遍。在工作場所也常常能感受到對中國人的懷疑眼神。鑒于此,可以預見的是,接下來的數年會有更多在中國出生、在美受教育的華裔科學家從美國走出他國。”謝宇研究團隊成員表示。

在寒蟬效應的影響下,即使留在美國的華裔學者,恐怕也很難像過去那樣主導非官方的合作,起到橋樑的作用。相比美國本土的科學家,華裔科學家作爲被懷疑的對象更要小心謹慎。

在謝宇看來,至少對於基礎科學來說,成果在哪國發表並不是最重要的,因爲研究的成果是整個科學界共享的。最重要的是尊重每個科學家根據自身情況作出的選擇。無論出國還是回國,科學家都是他爲了前途、爲了科學事業得到更好的發展,這種心態是世界性的,與國籍無關。

新的階段,青年科學家何去何從?

在謝宇看來,2018年之後,中美科技交流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2018年以後,中國行動計劃在字面上結束,但管理和審查沒有隨之消失,中美科技交流進入了一個正常化管理的階段。對華裔學者來說,新的階段在程序和情感認同兩方面都改變了他們的境遇。

從程序上講,現在華裔科學家和中國的合作來往需要通報,包括在中國兼職情況,甚至來往機票由誰出資。過去少有這類程序上的要求,但現在越來越多。在可見的未來,這類要求會進一步常規化,而且程序會更加繁瑣。這也迫使很多有和中國合作項目的科學家放棄申請政府資金,或者放棄合作。

從情感上講,華裔學者要應對對華人的歧視和偏見,日常生活中也可能感覺不受欢迎。而且華裔學者申請經費的比例、申請通過的比例也出現全方位的下降。在日常的、非正式渠道的活動中上華裔學者的感受都會比以前差很多。

相比擔心未知的中美關係對華裔科學家境遇和選擇的影響,一位研究科技政策和創新政策的華人學者更擔心中國對青年科學家的吸引力。他強調,儘管在美華裔科學家的回國率有所上升,但在吸引留美青年科學家這方面,國內的競爭力仍然有限。

儘管謝宇等人的研究強調了華裔科學家回流中國的趨勢,但他們也提到,相對於華裔美國科學家/工程師的總人數,返回中國的科學家人數仍然非常少。絕大多數科學家更願意留在美國繼續工作,尤其是青年科學家。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報告,2005年至2015年期間,持有臨時簽證的美國博士學位獲得者的平均“居留率”(獲得博士學位後計劃留在美國的比例)爲73.7%。而來自中國的臨時簽證持有者,平均居留率爲87.2%[7]。

2018年中國行動計劃啓動之後,華裔科學家回流的速度確實有所上升。但相比初級科學家,回流更快的是資深科學家。資深科學家是那些生涯發表25篇論文以上、表現優於97%同行的科學家。數據表明,2018年之後在各領域,華裔資深科學家回國率的增長都要比初級科學家更快。生命科學領域初級科學家的回國率甚至有所放緩。

剛剛獲得博士學位之後的幾年,往往是科學家們的黃金年齡。2018年後回到中國的資深華裔科學家們,很多人最重要的成果也是青年時期在美國做出的。即使受到中國行動計劃的衝擊,現在美國仍然吸引着大量華裔科學家,尤其是剛剛畢業的青年科學家在科研的黃金年齡全力以赴。

這位學者表示,“現在好多學者回來的時候已經功成名就了,我們當然也需要功成名就的科學家。但是我們也需要那些思維非常活躍、可以想出新點子的青年科學家。中國研究想要做出從0到1的創新,需要這些人。”

中國行動計劃名亡實存的背景下,華裔學者找到一份教職無疑會更艱難。在政治左右科學交流的當下和未來,沒有資歷的華裔青年科學家們無疑是一個尷尬的群體,只能艱難徘徊在中美去留之間。

11月15日的美中兩國元首會晤,或許爲身在海外的華裔科學家們帶來轉機。中方強調:“中美在諸多領域存在廣泛共同利益,既包括經貿、農業等傳統領域,也包括氣候變化、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雙方要充分用好在外交、經濟、金融、商務、農業等領域恢復或建立的機制,開展禁毒、司法執法、人工智能、科技等領域合作。”

這次中美兩國元首會晤,如果能夠緩和兩國科學界逐漸背道而馳的趨勢,對華裔科學家和整個科學共同體來說都是好消息。兩國的科學界是否能恢復過去的緊密合作,還留待時間檢驗。

